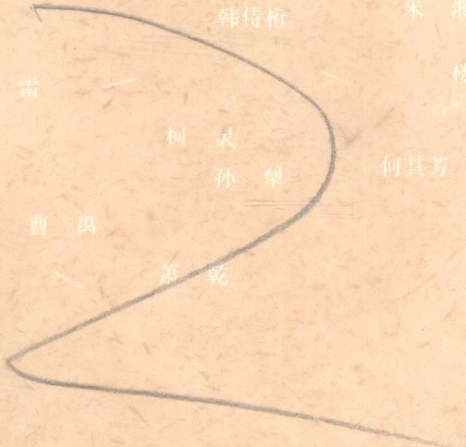


杨 扬 选编

文路沧桑

中国著名作家自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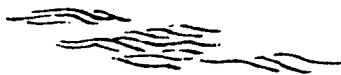


包天笑 鲁迅 陈衡哲 叶圣陶
郭沫若 洪深
徐志摩 郁达夫 庐隐 林语堂 茅盾 闻一多
许钦文 朱自清 丰子恺 沈从文 冰心
曹聚仁 夏衍 老舍 苏雪林 胡风
废名 梁实秋 梁宗岱
冯至 巴金 施蛰存 聂绀弩 钱歌川
张爱玲 傅雷 韩侍梅 朱湘 楼适夷
丁玲 柯灵 孙犁 何其芳
曹禺 萧乾
艾青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文路沧桑



中国著名作家自述

杨 扬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路沧桑：中国著名作家自述 / 杨扬选编.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5

ISBN 978-7-308-05876-6

I. 文… II. 杨… III. 作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3390 号

文路沧桑：中国著名作家自述

杨 扬 选编

责任编辑 宋旭华 黄宝忠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电话: 0571—88925592, 88273066 (传真)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德清县第二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70 千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5876-6

定 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录

- 001 <包天笑:在《小说林》
- 006 <鲁 迅:《呐喊》自序
- 010 <郭沫若:学生时代(节选)
- 029 <陈衡哲:我幼时求学的经过
- 036 <洪 深:印象的自传
- 038 <叶圣陶:略 叙
- 039 <林语堂:圣约翰大学
- 043 <郁达夫:水样的春愁
- 048 <茅 盾: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
- 064 <徐志摩:自 剖
- 069 <许钦文:稽山鉴水间
- 076 <庐 隐:大学时代
- 084 <丰子恺:我的苦学经验
- 093 <朱自清:我是扬州人
- 097 <闻一多:自 传
- 098 <老 舍:三年写作自述
- 106 <苏雪林:我写作的动机和经过
- 109 <夏 衍: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 123 <冰 心:我的童年
- 131 <曹聚仁:我的读书经验

- 134 < 废 名:我怎样读《论语》
- 137 < 沈从文:水 云(上)
- 154 < 胡 风:东京时期
- 159 < 梁宗岱:我的简史
- 168 < 聂绀弩:自 传
- 170 < 梁实秋:清华八年(节选)
- 180 < 钱歌川:在中华书局服务的回忆
- 185 < 巴 金:文学生活五十年
- 194 < 朱 湘:我的童年
- 201 < 施蛰存:《现代》杂忆
- 227 < 楼适夷:零零碎碎的记忆
- 242 < 冯 至: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
- 248 < 傅 雷:自 述
- 255 < 韩侍桁:我的经历与交往
- 273 < 柯 灵:文字生涯第一步
- 279 < 萧 乾:给自己的信
- 294 < 丁 玲:南京囚居回忆
- 309 < 艾 青:我的创作生涯
- 318 < 曹 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
- 338 < 何其芳:梦中道路
- 342 < 孙 犁:文字生涯
- 347 < 张爱玲:私 语

在《小说林》

包天笑 (1876—1973),原名包天毅,江苏吴县人。通俗文学作家。主要作品有《钏影楼回忆录》等。

在报馆里编新闻,于每日的时间,很有关系。编要闻,时间最晚,因为要等北京的专电到来。那种专电,往往要到夜里十二点钟以后,甚而至于到午夜两三点钟送到,也说不定。为什么这样迟呢?原来那时的电报是分几等的,如一等电、二等电是官电,民间不许通行;三等、四等电,方是民电,又称为急电,我们所打的乃是四等电(及至民国成立以后,乃规定有新闻电,以便利报界。四等电每字一角,新闻电特别便宜,每字仅三分)。当然电报局要先发官电,继发民电,然后方发新闻电,即各报馆的专电了。

好在陈景韩那时是住在报馆里的(他的夫人故世后,其时尚未续弦),不必深夜归家,那便利得多。还有报纸全部排好,拼成版子,将要开印的时候,还要仔细看一遍,有无错误,这叫做“看大样”。大概看大样的事,属于总编辑的,也是在深夜最迟的,但罗孝高不来,两位广东先生也不管,为了怕要闻中有什么错误矛盾之处,景韩也就看看了。

本埠新闻的编辑,比较要早得多,大概到下午九点钟的时候,访稿全都来了,编本埠新闻的到十点钟就没事了。如果在九点钟以后,发生了特别事故,有重要新闻,明晨必须见报的,当然可以加入,其余的琐闻细事,他们也就不再送稿了。至于编外埠新闻的,更要早一点。从前还没有快信、航邮,下午五点钟以后,邮差不再送信了,把当日所到的信,评定它的轻重与缓急,发清了

稿子(有的须要修正一下),就没有你的事了。

刚到上海,住在旅馆里,曾孟朴就托徐念慈来访问我了,便是商量请我到“小说林编译所”去。单写小说,便不必一定要到编译所去,当时已流行了计字数酬稿费的风气了。但是他们还要我去帮助他们看稿子与改稿子,那就非去不可了。因为《小说林》登报征求来的稿子,非常之多,长篇短篇,译本创作,文言白话,种种不一,都要从头至尾,一一看过,然后决定收受,那是很费工夫的事。还有一种送来的小说,它的情节、意旨、结构、描写都很好,而文笔不佳,词不达意,那也就有删改润色的必要了。

我也告诉了他们进入时报馆的事,待时报馆的事定局了,再接受《小说林》的事。再则我那时房子也没有租定,住在旅馆里,纷乱如麻,未能决定。及至时报馆事定局了,我觉得反正上半年没有事,便接受《小说林》的事。我们规定上午九点钟至十二点钟,星期休假(报馆是星期不休假的),他们每月送我四十元,我也很为满意。我有了时报馆的八十元,再加上《小说林》的四十元,每月有一百二十元的固定收入,而我的家庭开支与个人零用,至多不过五六十元而已,不是很有余裕吗?

况且我还有写小说的额外收入呢。写小说便成为我一种副业了,起初大家不知道我在上海,后来见了时报馆上登了我的长篇连载小说,许多人才知道了。这个时候,上海的小说杂志正风起云涌,都写了信来,还有自己来造访的。狄楚青的有正书局也出了《小说时报》,本来是陈景韩编的,我去了与景韩轮流编辑,我们是不取它的编辑费,但稿费却照算的。其时还有龚子英编的《新新小说》,吴趼人编的《月月小说》,我都写有小说稿子,此外什么小说杂志也记不清楚了。

这时上海的小说市价,普通是每千字两元为标准,这一级的小说,已不需修改的了。也有每千字一元的,甚至有每千字仅五角的,这些稿子大概要加以删改,但是许多出版家,贪便宜,杀穷鬼,粗制滥造,也是有的。更有一些穷文人,为了生活所迫,虽然他的稿子很不坏,但深入窘乡时,也不待善价而沽了。像那位笔名平江不肖生的向恺然君,他从日本回国时,写了一部《留东外史》,描写当时一般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留学的状况,到上海来,兜来兜去,这些书贾,以为其人不见经传,无人肯要,就是以每千字五角,卖给某书贾的。谁知后来销数甚佳,却赚了不少钱。

我的小说,后来涨价到每千字三元,那是商务印书馆要我在他们的教育杂志上写教育小说而加价的(按,此一笔稿费,适在商务印书馆逐年增资期中,他们请我把稿费作为股份,我亦允之,每月亦不过三四十元而已),这算是特别优待。但在时报馆(有正书局)及《小说林》两个基本地方,仍作每千字两元算。其时林琴南先生已在商务印书馆及其他出版社译写小说,商务送他每千字五元,但林先生不谙西文,必须与人合作,合作的大半是他的友朋与学生,五元之中,林先生即使取了大份,亦不过千字三元(后来商务印书馆给林先生每千字六元)。

这时候写小说,以文言为尚,尤其是译文,那个风气,可算是林琴翁开的。林翁深于《史》、《汉》,出笔高古而又风华,大家以为很好,靡然从风的学他的笔调。后来到“五四”时代,极力提倡用语体文的如鲁迅、胡适之辈,所译写的短篇小说,也是用文言的,其余的更不必说了。不过如果写章回小说,每回都有回目,纯中国旧小说的体裁的,沿传统下来的是用白话文了。

所以曾孟朴的《孽海花》,是用章回式旧小说体裁,而是以白话文写的。他写的同、光之间的北京掌故,常常是用北京话,而在京话的对白中,却要说得漂亮,简捷俏皮,好在他是住过北京的,可以对付。不过他的《孽海花》实在写得太慢了。在《小说林》杂志上预告,每期可以登一回(《小说林》是月刊),但他还是常常脱期,即使不脱期的话,每期登一回,试以全书八十回而言,也须六年又八个月,可谓“长线放远鹞”了。

孟朴的写小说,正与我相反,我是写了下来,不加修饰,并且不起第二回稿,以前写制艺文、叙事文,都是如此。直到如今,有好多小说,我已记不起它的内容,并且记不起它的题旨与书名了。我想:这也是我的一个恶癖与惰性,必然因此而错误很多吧?孟朴却不然,他是句斟字酌,改了又改,甚至将做好的一两回全部推翻了,从新再做起来,也是有的。可是错误还是有的,因为《孽海花》不是虚构,而是影射那时代的实事的。孟朴的著书与写小说,全在夜里工作,至少要到半夜,时常至于天晓,因为他是有烟霞癖的,他独居在《小说林》编辑所的楼上,他的家眷都不在此。

他的有烟霞癖,为了他的多病,他在《孽海花》小说上的笔名,不是叫做“东亚病夫”吗?为了这个缘故,他在上午是不起身的,有时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起身,起身以后,便与“阿芙蓉”为伴。

我每天到《小说林》去是在上午,那个时候,他正是“春眠不觉晓”,在他的黑甜乡里,不便去惊动他。要去访他,最好是在吃过夜饭后,而他也是精神最健旺,即使和你谈一个通宵,也不算一回事。

在《小说林》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志愿,可惜到后来,这个志愿,一个都没有偿。因为孟朴说,他的《孽海花》,写到庚子拳变,两宫回銮以后,就结束不写了,赛金花让她活下去吧,也就无关紧要了。因此徐念慈(《小说林》总编辑)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记东三省红胡子的事。”在清代称红胡子为胡匪,又称为马贼,民间则有称为义勇军的,这时候正在崛起时代,他也起好了一个书名,正在搜集材料。他说:“这部小说,正好接在《孽海花》之后,可以出版。”

我说:“我想写革命事迹。”当时革命党东起西应,排满风潮热烈。恰有徐锡麟、秋瑾的一件事发生,秋瑾是中国女子中革命的第一人,我想把秋瑾做书中的主人,而贯穿以各处革命的事迹。书名也已拟好了,叫做《碧血幕》,并且在《小说林》杂志上登载过一两回的,后来《小说林》杂志不出版了,我也就此搁笔了。

孟朴的《孽海花》始终没有完篇,最初出了有二十回的单行本,倒也风行一时。但是这单行本出版以后,虽然书中人物出于影射,然而核对事迹,一望而知。因此得罪了许多老前辈,第一,他的老岳丈汪柳门便不以为然,更有许多还是他的父执,尤其苏州人中,如陆凤石、汪芝房、叶鞠裳等,对于他都有谴责之词。后来端午桥邀了他去,说何必写这种小说得罪人呢?你何妨到我这里来呢?(旧回目中,本亦有涉及端方的事)这时他们又搞什么“宏文”馆,编什么《博物大辞典》,那时我已不在《小说林》了。总之资本已经蚀光,关门大吉。

这以后,孟朴便浮沉于宦海中。辛亥以后,陈陶遗任江苏省长时,他是什么水利局长、财政厅,闹了一下子,我也弄不清楚,其实吏事非其所习,他是一个文学家呢。

到1927年,他官又不做了,他的大公子曾虚白从法国留学回来,在上海开了一家“真美善书店”(我们称之为父子书店),又出了《真美善》杂志。《孽海花》又写了十余回,写到赛金花那时从洪宅出走为止,那一个回目は《青阳港·好鸟离笼》,以后便不曾写下去了。

徐念慈的红胡子小说,可怜他并不曾着笔,便这样资志以没了。我的《碧血幕》,也不曾继续写下去,后来便是辛亥革命,仅仅秋瑾一方面的事,也不足以包罗许多史实。但我对于这个志愿,当时总搁在心头,老想以一个与政治无关的人,为书中的主角,以贯通史实,这不但写革命以前的事,更可以写革命以后的事了,只是我却想不起我的书中主人。

直到民国七八年间,我在北京,和张岱杉先生(名弧,别号超观,绍兴人,曾一度为财政部长,是前清举人)谈起此事,他知道我要写此历史小说,他提醒我道:“眼前有一个极适当的人,你没有留意吗?”我问是谁,他说:“梅兰芳将来是一个成名的人,而且都搭得上政治历史的,何不把他为书中主角呢?”我被他提醒了,大为称善,于是我便写了《留芳记》,但也只写了二十回,给林琴南先生看过,他还给我写了一篇序文,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关于写《留芳记》的事,我后将再述。

在从前以一个文人,办点商业性质的事,终究是失败的多数。《小说林》也是如此,虽然所出的书,倒也不少,销路也不差,还是亏本。譬如说:放出的账,收不回来;管理处不得其法等等;而且出版物是有时间性的,尤其是小说。他们是自办印刷所、排字房的,后来搜出了半房间的铅字,都是拆了版子,不归原位,倾弃在那里,只好作为废铅卖了。诸如此类,都是吃了人家的亏。时报后来的失败也是如此,他们两位,狄楚青与曾孟朴,都是公子哥儿呀!

《呐喊》自序

鲁 迅 (1881—1936), 原名周树人, 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思想家。1917 年在《新青年》发表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自此确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 后来大半忘却了, 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 虽说可以使人欢欣, 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 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 又有什么意味呢, 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 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 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 曾经常常, ——几乎是每天, 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 年纪可是忘却了, 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 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 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 在侮蔑里接了钱, 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 又须忙别的事了, 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 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 冬天的芦根, 经霜三年的甘蔗, 蟋蟀要原对的, 结子的平地木, ……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 我以为在这途路中, 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我要到 N 进 K 学堂去了, 仿佛是想走异路, 逃异地, 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 办了八元的川资, 说是由我的自便; 然而伊哭了, 这正是情理中的事, 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 所谓学洋务, 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 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 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 而况伊

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

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方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1922年12月3日，鲁迅记于北京

学生时代(节选)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以创作新诗《女神》步入文坛。其后,在小说、戏剧、散文等诸多领域,均有大的成就。

四

自己本是爱好文学的人,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到日本去学习医科。日本人的教育方针是灌注主义,生拉活扯地把一些学识灌进学生的脑里。这在我又是一番苦痛。在高等学校的时候倒还没有感觉着怎么,因为那儿的功课一半以上是语学,也可以说就是文学。进了大学,情形便迥然不同了。天天闹的是“姆士苦鲁士”(musculus,筋肉),“奈尔乌士”(nervus,神经),“欺尔苦拉穹”(circulation,循环),“勒斯披拉穹”(respiration,呼吸),并没有多少道理,只是乌士、鲁士、拉穹、沙穹的死记些外国名辞。一个脑筋成为一个世界漫游者的皮篋,纵横狼藉地贴满了各个口岸、各种文字的旅馆招贴。

在我自己还有一种身体上的缺陷,是我在十七岁时,得过一次重症伤寒,两只耳朵得了中耳加达儿,耳鸣,重听。原因是由于高热的关系使鼓膜凹陷了,在传播声音的机构上生了障碍。在高等学校时,因为那儿班上的人数少,每班至多只四五十个人,教室不大,这种障碍倒还没有感觉到怎样的为难。进了大学,特别是医科,每班的人数在一百人以上,所有的讲义都是口授笔记。因此自己的不充分的听力便成为了很大的障碍。

就这样,在身心两方都感受着痛苦。在进大学后没一年工夫,我深深感觉着我的学医是走错了路。1919年的暑假,我早就想改入文科,但反对最激烈的便是我自己的老婆。在她的想法又不同,她是和我同受着生活上的压迫的。她认定医学可以作为将来的生活的保障。而我自己所身受的痛苦,她又并没有身受。像那种眼睛所看不见的痛苦,你就诉说出来,别人也只把你当成神经过敏。因为有了她的反对,于是乎我的迁怒便是恨她,甚且唾弃一切的科学。歌德的《浮士德》投了我的嗜好,便是在这个时候。

在1919年的夏天,我零碎地在开始作《浮士德》的翻译,特别是那第一部开首浮士德咒骂学问的一段独白,就好像出自我自己的心境。我翻译它,也就好像我自己在做文章。那场独白的译文在那年《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发表过。第二年春间经宗白华的劝诱,我又曾把那《天上序曲》和第二部的开首一场《风光明媚的地方》译了出来,也在《学灯》上发表过。

就在宗白华往德国留学的时候,我自己却是想跑回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眷念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晨安》和《匪徒颂》都是对于她的颂词。特别是《匪徒颂》,那是对日本新闻界的愤慨,日本记者称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学生为“学匪”,为抗议“学匪”的诬蔑,便写出了那首颂歌。在“五四”以后的国内青年,大家感受着知识欲的驱迫,都争先恐后地跑向外国去的时候,我处在外国的人却苦于知识的桎梏想自由解脱,跑回国去投进我爱人的怀里。我那时候想回国去,也并没有多么大的野心。就像太戈尔的《园丁集》里那个只想替女王拉上鞋跟的园丁一样,我是只想跑回中国去,在那儿的中、小学校里当一名国文教员。

1920年7月10日,我索性放下了决心,别离了安那和两个孩子,跑到门司,想乘船回到上海。那时候有一位朋友在门司养病(就是《残春》中的贺君),我去看他时,他的病也快要脱体了,打算在7月底退院回国,约我和他同道。我也想到在上海并没有熟人,地方也不熟悉,1915年的“五七”虽然回去过一次,但只在旅馆里呆了三天,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对于那未知的上海不免隐隐地含着一种恐怖。乐得有伴,我就答应了他,又由门司折回福冈。折回福冈时是7月19日,就在那天,我意外地接到了一封张东荪的来信。

张东荪是当时的《时事新报》的主笔。信里说他们有几位同志,组织了一个共学社,打算介绍海外的名著。《浮士德》正是名著之一,因我曾零碎地翻译过一些,他便劝诱我从事全译。条件在《时事新报》上有广告登着,售稿或版税都听随自便。

我得到这封信时异常高兴,安那不用说也喜出望外。我便立地写了一封回信,接受了提议,着手《浮士德》的全译,把回国的计划暂时中止了。

西洋的诗剧,据我看来,恐怕是很值得考虑的一种文学形式,对话都用韵文表现,实在是太不自然。《浮士德》这部诗剧,单就第一部而言,仅可称为文字游戏之处要在对成以上,像那《欧北和酒寮》、《魔女之厨》、《瓦普几司之夜》及《夜梦》,要算是最没有诗意的地方。那些文字掺杂在诗剧里面而滥竽诗名,仅是在有韵调的铿锵而已。在这些地方译得最吃力。假如要用散文译出时,会成为全无意味的一些骸骨。用韵文译出,也不外是下乘的游戏文字而已。因此,我觉得元代杂剧,和以后的中国戏曲,唱与白分开,唱用韵文以抒情,白用散文以叙事,比之纯用韵文的西洋诗剧似乎是较近情理的。

译《浮士德》的第一部费了四个礼拜的工夫。我的初稿是用毛笔在日本的“改良半纸”上写出的。由于涂抹得厉害,我又工整地誊写过一遍。于是将近一个暑假的时间都为此消费了。第二部更长,更难译。难译的原故就因为那儿的戏文字比第一部更多。全剧的构成过于支离,而那里面所包含的帝王思想,反对革命(这个革命的意义与现代的不同),使我最难忍耐。因此我便改变了初志,只译出第一部来印行,第二部不译。这个办法并不是由我创始,《浮士德》的英译有三十多种,仅译第一部的在二十种以上,把第二部全译了的不上十种。演《浮士德》的人,也多只演第一部。因此我便写信给共学社,提出仅译第一部的建议。不知道是那封信邮失了,还是共学社的人看见我不想译完,便以为没有出版的价值,信去后,一直没有得到回信。不久学校也开课了,我又只好把译稿收拾起来,放在一个小小的壁橱里,等有机会时再来译第二部。回国的念头同时也寄放着了。

不幸我又遇着了一次“鼠灾”。学校开课之后大约有四五个礼拜的光景,我在一天礼拜日想把译稿取出来整理一下,同时也想利用礼拜和每日夜间的余暇来试作第二部的翻译,好使工作告一个结束。待把壁橱打开,放在壁橱角上的原稿,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分量不见了。那壁橱原来有一个窟窿和